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羊城晚报

人文周刊 · 广角

2020年10月18日/星期日/副刊编辑部主编/责编 吴小攀 / 美编 黄文倩 / 校对 温瀚

A6

《夺冠》的成功对体育题材电影创作的启示

从“不可能”到“不,可能!”

□祁海

A 以现代观念诠释女排精神

在许多人眼中,不怕流血流汗,夺冠为国争光,就是“女排精神”的全部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国女排每次夺冠,都是举国欢腾,《夺冠》上半部再现了这个激情年代。

但《夺冠》并非简单地怀旧,该片的故事延伸到21世纪,竟出现了另一番真实景象:新一代中国女排队员疲弱涣散,在国际比赛中多胜少胜,即使赢球也不见全国同胞上街狂欢。女排队员的价值观念也与以往不同,主攻手竟说她打球就是为了赚钱,让乡下父母脱贫;曾为国争光的女排老将郎平,竟出国当教练,指挥外国球队打败了中国女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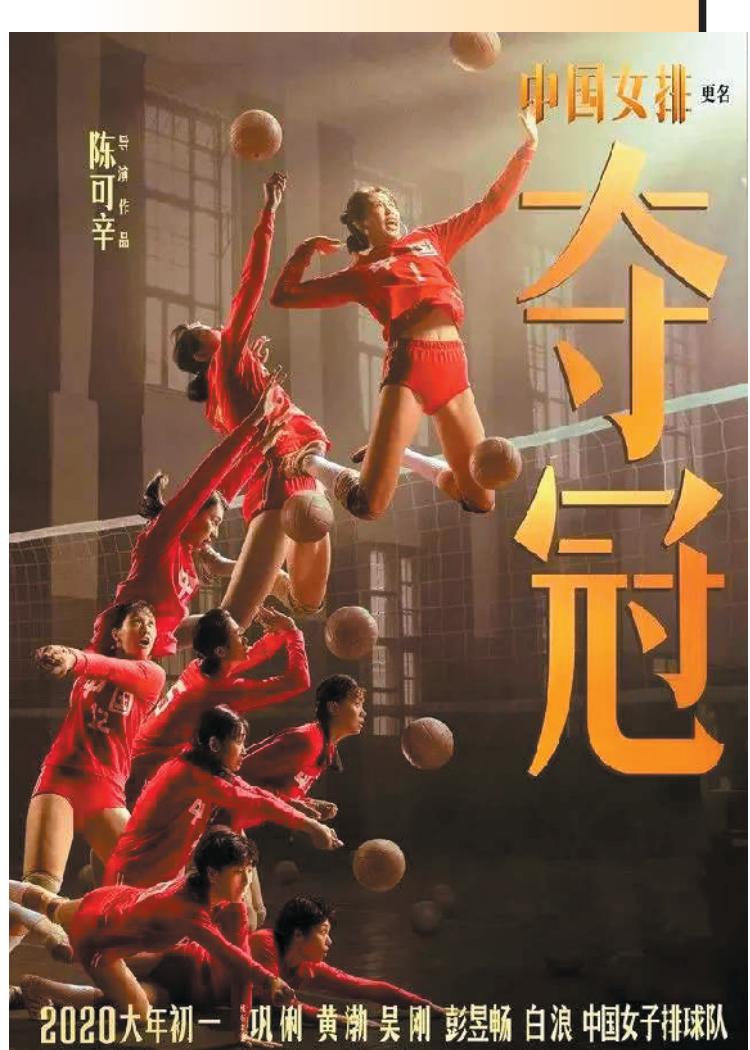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不是说,女排精神已经过时?非也!《夺冠》要用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延续女排精神,主要是通过塑造一位反传统的“另类”爱国者郎平去完成。郎平真心爱中国女排,但她清醒地看到中国女排不可能脱离已发生巨变的大环境,中国女排若要重新崛起,队伍建设模式必须求新求变,为此就

要承受比流血流汗更艰苦的巨大压力。郎平到外国球队执教,是为了拓宽国际视野,卧薪尝胆,但遭世人误解。她回国执教之后挑战旧观念旧体制,更是前路艰险,也要挨骂!忍辱负重,是一种更可贵的拼搏精神。

对于“夺冠”的含义,郎平有新的理解。一位外国记者问:“你们中国人,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?”郎平回答:“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,等有一天,我们的内心强大了,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价值。”郎平培养的新一代球员也是强者,但“强”的第一标志已不是奖杯,而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,只要有这种精神,即使不赢球也虽败犹荣!这就将爱国热情上升为人生哲理,使女排精神的价值大大拓展,冲出国界,让更多的人共赏。

《夺冠》后半部的郎平,已不是只会拼体力的运动员,而是一位改革家,其胸怀境界,是以往国产体育片里的主人公无法比拟的。

但是,世界上再难闯的险关,也有勇者敢碰。取材于中国女排真实事迹的故事片《夺冠》,就做到两个观念都有新突破!这是我国体育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突破,对今后同类题材电影的创作颇有启示。



学林 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!”

C 才艺高超敢于探索

一部电影,能不能做到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都出新?很难!这两者之一能出新,已属成功之作。

但是,世界上再难闯的险关,也有勇者敢碰。取材于中国女排真实事迹的故事片《夺冠》,就做到两个观念都有新突破!这是我国体育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突破,对今后同类题材电影的创作颇有启示。

但是,世界上再难闯的险关,也有勇者敢碰。取材于中国女排真实事迹的故事片《夺冠》,就做到两个观念都有新突破!这是我国体育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突破,对今后同类题材电影的创作颇有启示。

《夺冠》不乏喜剧色彩。如扮演小教练和老教练的演员彭昱畅和黄渤,都富有谐趣喜感,在体育片中很少见,避免了刻板枯燥之弊。

《夺冠》的造型风格也精心设计,体现不同年代的生活质感。影片上半部突出四十多年前的历史风貌,镜头调度沉稳,服装、场景多用有点“土气”的艳绿艳红,影调用偏黄大平光,颇像老旧的胶片电影。影片后半部突出现代感,镜头灵动活跃,服装、场景的造型多用流线型曲线,拍人物多用逆光勾勒轮廓,颇具时尚风格。这部体育片还有一大创造:拍摄中巴女排大战,特意请中巴两国女排再打一场,用13台摄影机同时拍摄,既有真实感,又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(如镜头组接、运动、拍摄角度等),拿到有用素材,提高了艺术质量。

《夺冠》在一部作品中能让三大电影美学流派各展其妙,熔铸成新的电影语言,1+1+1>3,这就使该片成为充分发挥综合艺术表现力的新型电影,在国产片中极为罕见。

人生一世,能获得一次重大成功已很难得。功成名就之后不吃老本,继续奋勇进取,就更难得!电影《夺冠》将郎平是这样的人,拍摄影片的导演陈可辛、演员巩俐、摄影师赵晓时等也是这样的人,他(她)们都是早已获奖无数的影坛名家,但不享过往荣誉,敢于创作难度特别大的《夺冠》,我不仅佩服他们的才艺,更敬重他们的探索精神!



□吴承学

更难得的是,《夺冠》不是只求真实。《夺冠》很有戏,但并非胡编乱造,而是善于发掘真实历史中本身就具有戏剧性的素材,加以提炼强化,巧妙编织。

该片借鉴了戏剧化电影刻画人物性格、人物关系变化发展的手法。女主人公郎平在影片前段是勤学苦练为国夺取五连冠的女排“铁榔头”,后来居然成为外国女排主教练,带领外国队在北京打败中国女排,最后又回国当中国女排主教练,带领落后的弱队东山再起,打败外国强队,重登世界冠军宝座。

如此大起大落的反复变身,充满强烈的戏剧性,但确是真实郎平的经历,不违背影片的纪实风格。巩俐扮演中年郎平,十分恰当,不仅是演技娴熟,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成熟,已到中年的巩俐阅历丰富,饱经沧桑,再不是当年《红高粱》里的小新娘,她就更容易理解郎平。剧中的郎平与陪打教练的关系也复杂多变,从亲密战友到竞争对手再到让贤互助,很有戏。

写真人真事的史诗电影,其

发生明显的变化。近古以来的中国文体学、文章学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更大,更为直接。本书从一些比较特殊、少人注意的理论形态切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与文章学。比如,近古以来的文章总集与文章学、文体学的新形态,评点之学的渊源流变,目录学与文学批评,类书与文学批评,近古以来文章学与文体学新形态,以及相关的经典学问题。

书中所收的论文,最早写于1982—1984年期间,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,最晚则是刊于《学术研究》2020年第六期的文章。本书写作时间的跨度差不多贯穿了我已有的学术生涯。

回首匆匆,许多经眼事物,转瞬之间,已成遥远的过去。

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

上个世纪50年代,我出生于潮州一个教师家庭。我的祖父长期在海外当私塾先生,“文革”中回国。父亲解放前在重庆、上海从事考古、电影等文化工作,解放后回到潮州任中学语文教师。从小学开始,我就遇到“文革”,一夜之间变成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幸好,温馨的家庭、丰富的藏书给我以最大的慰藉与保护,善良而有主见的母亲总是勉励和支持孩子读书向上。对我来说,这种印象是刻骨铭心的。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所谓的学习,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,没

有任何功利目的,当然也相当粗浅和零碎。但这些无心插柳之举,居然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某些终生难忘的“童子功”。更重要的是,我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喜爱与特长,多年以后,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志业便自然而然成了我的不二选择。

“文革”结束,我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,后来又继续攻读硕士、博士,圆了少年时的梦想。改革开放的时代,进入学术领域。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,在前辈学者的引领下,我们很快便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的进程。

我总认为,学术研究的目的,是为了提出有学术史意义的问题并期待解决,而不是为了填补空白。填补空白并不一定有意义,并非所有空白都需要学者去填补。文化创新的同时,需要文化保护。某些传统是需要有人保守,有人呵护的,就像茫茫大漠中的敦煌石窟需要一代代的守护者。

古人说,勤能补拙,其实,恒亦补拙。我别无所长,若有的话,便是固执。四十年来,固执于传统领域的研究。日于是,继之以夜;月于是,继之以年。坚守寂寞,远离喧嚣,以冀盈科而进,聚沙而成塔。

从事教职出于快乐选择

世上有许多伟大、荣耀的工作,我对之虽然佩服,但不羡慕。正如古人所说的,“我与我周旋

久,宁作我!”我深爱自己的工作和职业。我并不认为它比其他职业更为神圣、崇高,只是最适合我罢了。

小时曾读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,印象极为深刻。永州有三代从事捕蛇者,虽然“吾祖死于是,吾父死于是,今吾嗣之以十二年,几死者数矣。”但在赋敛制度下,捕蛇这种貌似最危险的职业,却能得到相对的安全与自由。不知为什么,我读这篇文章,常常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怪诞联想。我们世代以教师为业,我的爷爷是教师,我的父亲是教师,我十岁就开始当教师,教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至今已四十多年。捕蛇者世代从事此业,是由于一种无奈的消极选择,而我则是出于积极的快乐选择。

虽然,教师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曾非常低下,现在当然不同了,但毕竟不是有权势或可发财的职业。不过,我真心喜欢教师与学者这个宁静而干净的职业,这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。说得俗一点,鞋合不合适,只有脚知道。说得雅一点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陶渊明《杂诗》云:“昔闻长者言,掩耳每不喜。奈何五十年,忽已亲此事。”长者之言,往往老生常谈,宜为年轻人所不喜;而一旦亲涉此境,枨触遂多。我以前读此诗,领略尚浅,如今已成“长者”,读之则相视一笑,莫逆于心矣。

以上詹沧之语,乃一时之感触耳,不知后生闻之掩耳不喜否?

显微

生态诗写作的可持续性



者那样毫无节制地泛滥抒情,而是理性回望——包括他的生平历程——也就是将生命与生态联系起来,更多的是生命感和哲思。

作为散记(随笔录、杂记),无非是表达个人的见解,当然存在作者的审美,让人欣喜的是华海的《一声鸟鸣》并不以一般的“古典美”

作为自己的美学主见。诗人所感受的时间(时光)流逝——大地的变迁,给诗人呈现一幅幅宏大景象,以及其中的不可抗力——从春天到冬天、从小满到芒种、从朝暮之间,“在一滴水珠面前沉淀,随着柔韧的苇叶飘舞,我感到在靠近另一种节奏,靠近万物原来的样子”(《初夏》),这就是作者所感受到的气候(时间)的力量,是一种现代性的感觉。

“如果你想作一个诗人,首先要找回自己的故乡。”(《寻找乡野》),现代人的常态却是背井离乡的迁徙式,像候鸟,不断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。加上现代化在短时间内带来观念上的冲击,各个阶层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故乡,这是诗歌的方向之一。在现代化进程中,如何定义“自然”?到哪里寻找故乡?怎样缓解生存的焦虑?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,也是生态诗的关注主题,可以为自然写作注入文学的合法性和可能性,以及可持续性。

谈屑

茶中有真义

切中话题,言不凿空

曾国的茶文集《有茶气》副标题:“谬误与传说中的中国茶”,更明确地传达了他的旨趣所在。谈茶在历史流变中往往会出现话语共存的局面,传说、谬误在所难免,还会与其他话语形成竞争态势。作者有意拨乱反正,从这个立场出发,“有茶气”至少有两层意思:其一,谈茶时要诚心正意;第二,谈茶者要有精神气质。

众所周知,茶叶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。谈茶要谈出气质,不能不面对两个底线:物质方面不能有硬伤,精神方面不能自我阉割。从话题、文字到内容,《有茶气》表现出了难得的“品质感”,把这种品质感切开来看,会发现不同的观察面。

切中话题,言不凿空。话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。近年来,普洱茶话题热度一直不减,各种看法泾渭不一:《马云为什么去做普洱?》《方舟子谈茶,茶人应感欣慰》《都说换美元不如存茶,但存茶并不容易》等篇,都与普洱茶高度相关。其如他《喜茶疑云》等篇也紧扣当下话题。可以说其涉及的内容都是题有所出,言有所指。“在普洱茶里,人人争说‘老班章’和‘冰岛’等名山,这些名山不好买,买下来也有可能‘扑街’,因为意外太多。”意外太多,寥寥数字,便概括了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。

发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

善于发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。《有茶气》表现出了一种审慎气质,表面看起来是文本细读的功夫,核心却是通过敏锐的观察,看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。卢仝的孤独,是技艺的衰微,还是精神的没落?宋徽宗的时间穿越术,是权力的高压效应,还是审美的变相满足?中国茶叶因何衰败?中国有没有茶道?作者也直抒己见:“我慢慢发现,中国人喝茶,能够品出其他民族觉察不了的味道,茶道之上,正是中国人的味道。”

在当今这个谈茶话语普遍撕裂的时代,谈什么往往形成表面的冲突,而搞清楚谁在谈,怎么谈、为什么谈,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话语有时完全对立,有时又相反相成,竞争态势并不意味着你死我活,“真相”的变迁依赖于具体的词汇、句式和陈述关系,也隐藏在各式各样的解释框架中,其意义也随时间、地点、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。

